

亓长发  
著

史志诗文选



---

---

## 序　　言

《史志诗文选》是亓长发同志诗文中的一部分。是他二十多年来心血的结晶。

亓长发同志 1953 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1981 年后，又从事地方史志的编纂工作。从 1994 年开始，又研究和创作了一些诗词。他的史志论文和诗词曾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好评。如《就太平军北伐援军主帅问题与罗尔纲先生商榷》一文在 1981 年第三期的南开大学学报上发表后，很多近代史的刊物都加以转载。因为罗尔纲是中国学者研究太平天国史料的专家。亓长发同志能运用新的史料和观点与罗讨论上述问题是有影响的。再如他的《论辛亥革命后的黄兴》一文在武汉大学出版的《黄兴新论》书上发表后，“美国黄兴基金会”认为是好文章，因此特别发给他奖金和证书以资表彰。（上述《新论》曾用英文在美国出版发行）。又如他的《两个母亲》一文在香港中国文化馆主编的《我的母亲》书上（1987 年三月初版）发表后，也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注意。该书不但收有毛泽东、朱德、蒋介石、李宗仁、李济深等军政知名人士的文章、还有中外知名的人士陈香梅、杨振宁等的文章和访谈录，该书除中文本外，还有英文本在欧美各国发行。特别提出的是，亓长发同志在出席“纪念台儿庄大战五十五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台儿庄战役概述》在山东大学出版的《台儿庄大战和中国抗战》一书发表后，曾得到国内外研究此问题的专家的赞扬。

关于地方志方面，他是《中国方志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的委员，是《辞典》山东部分辞条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该书被评为华东地区 1988 年社科书籍一等奖，他也受到了奖励。《诗文选》中的地方志文

章是山东培训地方志骨干的教材。所以他曾受到地方志工作者的好评。

亓长发同志研究和创作诗词的时间虽短，但成绩已很突出。他现是“山东诗词学会”的会员，经常为《历山诗刊》撰稿，已发表的也很有特点和新意。

当然，亓长发同志的著作中，不可避免地还会有不足之处。他诚挚地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我是亓长发同志的同事和朋友。在他的《史志诗文选》出版之际，特向读者说了上面一些话。相信读者看了《诗文选》后，会对他作出客观的评价与指正。

张敬忠序于大明湖畔

二〇〇一年春

---

---

# 目 录

## 序言

鸦片战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
论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12)
太平军北伐的目标和失败的原因	(17)
太平军北伐及援军初胜后败的原因	(24)
太平军北伐主帅是李开芳吗?	(34)
就太平军北伐援军主帅与罗尔纲商榷	(38)
太平军在山东的斗争	(42)
关于李开芳“投降”的商榷	(46)
论毓贤	(53)
关于康有为的评价	(62)
论辛亥革命后的黄兴	(70)
辛亥革命前后的孙中山与山东	(81)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的山东讨袁战争	(94)
孙中山与山东讨袁护国军	(99)
山东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	(107)
滨海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贡献	(113)
抗日将领赵登禹传略	(124)
台儿庄大战概述	(130)
孙兰峰将军事略	(141)
黄凌汉奸案及侦破	(155)
刘善本驾机起义前后	(162)
敬爱的华岗校长	(171)

---

目 录

两个母亲.....	(176)
韩复榘、康生审判赵健民 .....	(180)
新中国建立初期党的统战政策及成就.....	(185)
方志学的形成和发展.....	(206)
新方志的编纂.....	(222)
方志学要有鲜明的阶级观点.....	(239)
新方志如何反映两个文明建设.....	(242)
漫谈修志的资料工作.....	(246)
《中国方志大辞典》简介.....	(251)
试论《泰山志》的编纂.....	(256)
关于“国民党志”的编写.....	(266)
即兴诗词.....	(277)

说明:《目录》中文章的一半题目与原书刊上发表的有出入,但内容没作任何改变。诗词大部分发表在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编辑出版的《征程放歌》和山东省诗词学会编辑出版的《历山诗刊》等书刊上。

---

## 鸦片战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它是英国蓄意挑起的侵略战争，美国、法国充当了助纣为虐的角色。这次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同时也激发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在当时不能统治中国，也永远不能统治中国。在纪念鸦片战争高潮一百五十周年之际，我们要进一步认识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要进一步认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在这方面，建国后出版的一些专著和论文中已有所反映。但美中不足，有的内容还很薄弱。如鸦片战争的上下限问题；美国、法国在这次战争中充当英国的帮凶问题；满蒙大臣和八旗官兵的抗战问题；对统治阶级中的抗战派和反鸦片战争的评价问题等。本文试就上述问题发表点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 （一）关于鸦片战争的上下限问题

一般专著和论文均把 1840—1842 年定为鸦片战争时期。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这不符合事实。从鸦片战争的始末考察，它的真正时期应当是 1838—1844 年。并且应分为三个阶段：1838—1839 年为第一阶段；1840—1842 年为第二阶段，1843—1844 年为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中，英、美等国已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仅英国每年输入的鸦片就达五万余箱<sup>①</sup>。1839 年 10 月 10 日，英国内阁已决定向中国进行侵略战争。不久，即派兵舰多艘对中国进行了六次武装挑衅，实际上已与中国进行了前哨战。与此同时，中国从 1838 年已开展禁烟运动。这年 10 月，广州万余人举行示威，反对英、美贩运鸦片至中国。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广州军民的支持下在虎门开始销毁英、美运来的鸦片230多万斤。向全世界表示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

1840—1842年是鸦片战争的高潮阶段。1840年6月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国对中国侵略逐步升级。兵力投入日益增多，战争范围日益扩大。即由广东向福建、台湾、浙江、江苏、天津、上海等地进攻。并于1842年8月强迫中国与之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中国割香港给英国；赔款2100万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在五处通商口岸派驻领事；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的税款，中国需同英国商定。与此同时，中国军民在林则徐、邓廷桢等领导下与侵略者作了英勇斗争，并取得了不小胜利。而广州的“平英团”、宁波的“黑水党”及长江下游两岸抗英义勇等，更是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与侵略者作斗争的典范。

1843—1844年是鸦片战争的第三阶段。在1843年10月，英国不满足于《南京条约》中取自中国的特权，又强迫中国与之签订了《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英国从这个条约中又取得了建立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以及片面“最惠国待遇”。而美国、法国也趁火打劫，1844年7月，美国强迫中国与之签订了《望厦条约》。同年10月，法国强迫中国与之签订了《黄埔条约》。此两年中，中国军队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没有大规模地与英国侵略者作战，但是中国人民却仍然自发地起来与英国侵略者作斗争。最有代表性的是广州升平社学等群众团体组织的十几万义勇于1843年反对英国在香港开市的斗争，1844年反对英国在广州河南强划租界的斗争。

总之，1838—1844年是鸦片战争时期。1840—1842年只是它的高潮阶段。只有这样划分，才能揭露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侵略中国的罪行；只有这样划分，才能反映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精神。

## (二)关于美国、法国在鸦片战争中充当英国帮凶的问题

鸦片战争是英国蓄意挑起的。它先是用商品，继之用鸦片，最后用炮舰。它是侵略中国的主要敌人。那么美国、法国在这次战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长期以来，他们的政府均说自己是“中立国”。但事实却给了它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美国在独立战争胜利后的第一年即 1783 年，派来中国的第一艘船，就是鸦片走私船。据十八世纪末的调查，在广州的美国商人几乎全部经营鸦片。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普金斯洋行和三十年代的旗昌洋行，都是美国在华的巨大贩毒组织。美国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数量仅次于英国。美国为了大规模地进行武装贩毒，特别建造了许多专门用来偷运鸦片的“飞剪船”。这种船不仅航行速度大，而且装备着大炮等武器。当其遇到中国水师巡查时，便发炮攻击，直冲而过。

美国向中国走私鸦片，同英国一样，首先是掠夺了中国大量财富。如据 1842 年美国一个鸦片贩子供认：他在过去三年中，不曾带一个银元来中国，但平均每年从中国运走一百万银元以上的丝和布<sup>②</sup>。

1838 年，中国禁烟运动开始后，美国和英国的鸦片贩子勾结，大肆进行破坏和捣乱。如这年 12 月 12 日，中国军队押着鸦片贩子在广州“洋馆”前面的广场上执行绞刑时，美国、英国的鸦片贩子砸碎绞架、赶走清军，捣乱刑场。1839 年，正当英国准备挑起侵略战争的时候，在广州的美商于这年 5 月联合上书美国国会，要求美国立即采取行动，同英国、法国、荷兰联合一致，强迫中国接受“凡中国埠头，俱要准外国人任意贸易”的蛮横要求。这份请愿书送到国会后，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不久便派加尼率美国东印度舰队来中国，为英国侵略军声援。美国总统严当姆斯于 1841 年初发表演说，称“英国宣战是完全有理由的。”悍然为英国侵略者辩护。1842 年 8 月，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决定利用中国的困难时机，进行讹诈。这年 12 月，美国总统泰勒在给国会的咨文中，建议正式派代表来华，主持外交和商务活动。国会立即通过。1843 年 5 月，美国派外交委员会委员顾盛为

专使,带兵舰三艘来中国进行恫吓<sup>3</sup>。1844年初,顾盛与两广总督程矞采谈判。要求中国在新开放的口岸里,美国必须获得与英国相同的通商条件。否则,将被看成是中国企图与美国为敌。同年5月,顾盛给程矞采的信中,更用强盗式的口气说:“除了绕好望角来华的美国舰队正在途中外,构成太平洋舰队的炮舰,也亦受命前来中国。”这年7月,强迫中国与之签订了《望厦条约》。在这个条约中,美国除取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里规定的各种特权外,还增加了美国军舰可以出入通商口岸,美国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等特权。一句话,美国当时对中国的侵略比起英国来,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8月写的《“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所说的:“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1844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sup>4</sup>

法国在鸦片战争中也是助纣为虐。1841年初,法国派真盛意来华,从事侵略活动。当英军进犯长江时,法国战舰“爱里贡”号和“费弗拉梯”号,在吴淞口鸣炮向英国侵略舰队致敬,并妄自闯入长江,侵犯中国主权。《南京条约》签订时,法舰“爱里贡”号舰长余西尔赶到英舰“汉华丽”号上参加了条约的签字仪式,为英国助威。1843年法国又派拉尊尼为专使,带兵舰八艘来华进行讹诈,1844年10月24日,强迫中国与之签订了《黄埔条约》。在这个条约中,法国不但取得了英、美侵略者已经取得的各项特权,而且还夺取了一些新的特权,如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自由传教等,从此,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们伴随着商品、鸦片、炮舰来到中国,一面收卖奸细,索集情况,宣传迷信,麻醉人民;一面勾结官府,欺压百姓,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得力工具。

总之，美国、法国在鸦片战争中充当了英国的帮凶、铁证如山，不容抹杀。

### (三)关于满蒙大臣和八旗官兵在反鸦片战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问题

一些专著和论文对汉族大臣如林则徐、邓廷桢和绿营官兵如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及其所部在反鸦片战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记述颇详，这是应该的。但对满、蒙大臣和八旗官兵在反鸦片战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却记述很略，甚直一笔代过或避而不谈，则是不公正的。因为在反鸦片战争中，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参加了。任何一个中华儿女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中作出了贡献，都应“一视同仁”，都应受到赞扬。为此，必须补充一部分满蒙大臣和八旗官兵的抗英事迹。

这方面的事迹不胜枚举，怡良、达洪阿、裕谦、长喜、海龄及其所部就是代表。

怡良(1791—1867)满洲正红旗人。瓜尔佳氏，字悦亭。1838年2月任广东巡抚。对英国输入鸦片非常愤慨，对英国侵略者有所认识。所以他与林则徐在道光二十年一(1840)七月初四的咨文中就指出：义律对中国提出的英船“如有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船即没官”的警告是“阳奉阴违”。因此“飞咨各省，一律防查。……倘有夷船驰进辖洋，即行严加剿逐。”<sup>⑤</sup>他支持林则徐、邓廷桢在广东禁烟。1840年11月投降派头目琦善至广东疏请尽撤海防守备，拟与英国议和时，他与广州将军满洲贵族阿精阿皆不列衔以示反对。琦善让他证明“英王常投书求通商，为则徐所拒，匿不以奏”，林则徐犯欺君之罪时，他“以事属于虚，为正言而止。”之所以如此，“盖两年来，怡良深服则徐正大，料事如见，故言无不听。”<sup>⑥</sup>琦善私自与英国签订《穿鼻条约》，内有割让香港等丧权辱国条款，举国愤慨，道光震怒。琦善害怕，矢口否认。怡良根据香港报纸披露的内容，揭发上奏，结果琦善被撤职查办，掉了一块抗英路上的绊脚石。他为抗英做出了贡献。

达洪阿(?—1853)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1835年任台湾镇总兵,1840年赏加提督衔。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与台湾道姚莹、参将邱镇功等,团结在藉的原提督王得禄,积极作防英准备。1841年9月30日,英国双枪炮舰一艘向鸡笼(基隆)挑衅,他督军还击,将敌舰击伤,触礁沉没,毙英军三十二人,生俘一百三十人,缴获武器、地图等战利品大宗。敌不甘心失败,10月19日,又派三桅兵舰一艘进犯三沙湾炮台,他又率军击退之。1842年3月11日,英军三桅兵舰三艘,驶入大安港炮轰,达洪阿不为所吓,仍命所部还击,俘敌四十九名。在抗英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sup>⑦</sup>

裕谦(约1795—1841)蒙古镶红旗人。博罗咸化,字鲁山,号舒亭。1840年署两江总督。鸦片战争爆发,他坚决抗战。奏请添筑火炮,建造炮台,加强江苏沿海防御。1841年2月,受命为钦差大臣赴浙江办理海防。对伊里布媚外卖国极为愤慨,并揭露琦善“弛备损威”。他挽留被革职的林则徐到浙江抗英。这年10月1日,英军攻陷定海。继攻镇海,他率四千人防守,亲自登城督战。情况危急,他率众宣誓:“今日之事,有死靡式,……受命专讨,义在必克,文武将佐,敢有受夷一纸书去镇海一步者,明正典刑”。“明日将战,战则不及言,今欲有言,凡军中谕旨奏疏及他文薄置行馆中”。“余无子,妻弱,一女在襁褓,可以德峻承祧,丧葬之费,取给而已。”表示了誓死卫国的决心。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总兵谢朝恩战死,提督余步云怯战溃逃,镇海失陷后,他悲愤投水殉难。敌人以十万金悬赏得其尸体,想一睹这位抗英者的面目。<sup>⑧</sup>

长喜(?—1842)满洲镶黄旗人。1842年任浙江乍浦副都统。在与英军作战中,他及其所部均表现了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这年5月20日,英国海陆军分两路向乍浦进攻,情况危急。长喜命副将洪公率满兵二百潜出城外,埋伏于陆家街傍。英军进城,伏兵四起奋击,歼敌四、五十名,敌用巨炮齐轰,洪公的大部中炮牺牲,他号召余部为死者报仇。镶红旗左领隆福御敌于天尊庙,火起突围,敌人穷追,他手刃敌

军数名，自刎而死。正黄旗左领额特赫，镶白旗防御贵顺率部埋伏在天尊庙内，敌人靠近，他们火器齐发，使敌受到巨大损失。后敌人增援，纵火夹攻，他们均英勇战死。正蓝旗骑校该抗阿率部守北门，城陷，有人劝他脱去顶帽，混入士兵中逃跑。他叱曰：“可废职求活耶？”结果被杀。中国军人的誓死卫国精神，不但中国军民赞扬，就是英国舰长利洛也很惊叹。他在《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中说：一个军官身受重伤被俘后，英人向他说：“不要怕，我们要对待你极其仁慈的。”。他说：“仁慈？我不需要仁慈，我是来替皇帝打仗的。我不领受仁慈，我也不对敌人仁慈。假使你们要表示仗义的话，请你们代我报告皇帝陛下，我一直战斗到最后一息，死于疆场之上。”不久他便死去了。长喜和乍浦同知韦逢甲则率余部在葫芦城集体自杀殉国。充分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sup>⑧</sup>

海龄（？—1842）满洲镶白旗人。郭洛罗氏。1841年初任京口（今镇江）副都统。为防英军侵略，积极备战。1842年7月英军来犯，他率千余人守城。由于参赞大臣齐慎、北湖提督刘允孝部在城外畏敌败退，他陷于孤立。但仍誓死奋战，打死打伤敌人一百八十五名。守军全部牺牲，海龄全家死难。<sup>⑨</sup>他及其所部的浴血抗战，不但中国的军民歌颂，就是英国海军大佐宾汉也叹服，他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说：“在这里，满兵作了一次最顽强的抵抗，他们寸土必争，因此每一个城角和炮眼都是短兵接战而攻陷的。……因为他们不肯投降，其中大多数被击毙，或被埋在现在正在着火的废墟下了。……下午六时，几支工兵冲到城的中心……发现许多房屋中狼藉着先杀死他们的妻子儿女，把他们的尸体投入井中和别的地方，再自杀的满兵的尸体。别人把脖子悬吊在柜子里或门后。……满兵的副都统海氏在败了的时候，坐在家中的一把椅子上，命令他的仆人点火烧房，故意死在火焰之中”。<sup>⑩</sup>恩格斯在其《英人对华的新侵略》一文中，对海龄及其所部在镇江抗英也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写道：“在英军……逼近了镇江城时候，他们才知道：“满清军队虽然没有军事技术，可是决不是没有

勇气和奋发精神的。那里的满清军队只有一千五百人，但他们却勇敢拼死地应战。直至全军覆没为止。在应战以前，他们好象早已料到战斗的结局，而将自己的妻子儿女绞死或淹死。许多尸首后来从他们淹死的井中捞出。清军副都统，看见战斗已遭失败，逐焚烧了自己的房屋，本人也投火死了。在此次战斗中，英军损失一百八十五人。”恩格斯还说：“为报复这个损失起见，他们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因为英军作战时那种极端残酷的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贪欲无厌的私贩行动完全相符合的。”<sup>14</sup>

总之，“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的民族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一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在反鸦片战争中就涌现出了许多民族英雄。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是中国人民的自豪！

#### (四)关于对统治阶级中的抗战派和反鸦片战争的评价问题

中国的反鸦片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因此，在政府宣战后，除军队参战外，中华民族各族人民都参加了这一卫国战争。其中有手工业工人，贫苦农民；也有统治阶级中的抗战派。后者除上述的各级官吏和封疆大臣外，地方绅士和知识分子在这一神圣的战争中是否也起了积极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只将“社学”中的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事迹补叙如下：

在反鸦片战争中，广州的反英群众团体是“升平社学”，领导人李芳是举人，何玉书是进士，他们联络地方士绅捐资建立的社学，曾招募义勇，团练御侮，是团结和组织人民进行抗英的核心机构。“东平社学”的领导人王韶光、高梁材是县丞，赖定生、杨立达、王韶贵是乡耆，何玉成是举人。他们联络地方绅士捐银五千两，筹建“驱夷忠勇祠”，表彰、抚恤和奖赏抗英的死者和伤者，为抗英事业作出了贡献。社学的领导人钱江、何大庚是浙江的著名知识分子，他们在广州抗英期间，曾写了《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小册子，在广州城内外广为散发，以便宣传和组织群众，该《公檄》首先揭发了英国的侵华罪行：“贩卖鸦

片，毒我生灵，伤民命奚止数百万众？耗民财奚啻数百万金？……恃其船坚炮利，由粤入闽，历浙入江。据我土地，戕我文武，淫我妇女，掠我资财，致使四省生民，惨罗锋镝，……暴其罪状，罄竹难穷；洗我烦冤，倾悔莫尽。实神人所共愤，覆载所不容”。《公檄》中也揭露了一些叛国分子的罪状。最后号召义民义士共引团练，同仇敌忾。他们为抗英事业出了力。

总之，在反鸦片战争中，统治阶级中的抗战派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他们对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也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有人却肯定他们。其理由：一是说这些人在鸦片战争前后都镇压过人民；二是说这些人所保卫的国家是封建的落后国家，是腐烂的“天朝”。笔者不同意第一种说法。因为统治阶级若不镇压人民就不称统治阶级了。这是其阶级地位决定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乏其人的。如南宋时的岳飞，明末时的史可法等等。他们镇压人民应予否定。但在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从而成为社会最主要矛盾的时候，他们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并领导军民去反抗民族敌人，就是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应该受到赞扬，就应该予以肯定。尤其是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给黄炎培的信中说：“中国现代的革命，首先和最主要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故可以上溯到反鸦片战争的林则徐及广州的‘平英团’。”<sup>④</sup>对林则徐应该如此，对上述人物当然也不应该例外。只是评价不同而矣。

当然，笔者也不同意第二种说法。而是同意范文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说法。他写道：“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停滞在封建社会阶段上，侵略者的英国则是方兴的资本主义社会，按照腐朽着的东西必然被发展着的东西所消灭的原则，林则徐的抗英是违犯社会发展规律，不应该肯定他的功绩，也不应该称为民族英雄。这样的人，我看，赐谥为机械公，谓可十分允当。……清朝政府反抗英国的侵略，正符合国家保护共同利益以免外来侵犯的原则。林则徐为首的一批统治者，为抗英出了力，为后来中国人民反帝运动开了端，中

国沦为半殖民地,还不能完全变成殖民地,就是靠中国人民 联合统治阶级的进步派,不屈不挠地进行顽强的抵抗……。如果照机械公那种想法。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来了,封建社会的中国就该束手认输、坐而待毙,一切抵抗都是违犯 社会发展规律的。那末,中国除了亡国,还有什么道路可走呢?”<sup>⑧</sup>

另外,说道光时的清政府是腐烂的“天朝”;那是和清初的康熙等比较相对而言 的。若是和清末的慈禧相比还是进步的多,尽管道光曾被迫与英、美、法侵略者签订了 不平等条约。因为是他命令林则徐、邓廷桢等在广东等地禁烟的,是他发谕向英国宣战 的,是他命令军队在各地抗战的,又是他将琦善、奕山、奕经、穆彰阿等叛国分子撤职 查办的。一句话,道光在反鸦片战争中是尽了一定责任的。尽管他是动摇妥协的。所以 中国军民保卫清政府所代表的中国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和歌颂林则徐、平英团一样 歌颂在这次战争中的所有爱国军民,对统治阶级的抗战派也不要另眼看待。

### 结束语

在鸦片战争时期,英、美、法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这是坏事。但也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即迫使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这正如毛泽同志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所说,“自从一八四〇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接着就是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法国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英国、法国、日本、沙皇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sup>⑨</sup>

(原载《泰安师专学报》1990 年 3、4 期)

**注：**

- ①《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第 616 页。
- ②《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丛书) 第 11 页。
- ③《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 第 104 页。
- ④《毛泽东选集》四卷本 第 1505—1506 页。
- ⑤《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三册 第 363—364 页。
- ⑥上书、第六册 第 27 页。
- ⑦《清史列传·达洪阿传。》
- ⑧见⑤第六册 第 368—369 页。
- ⑨见⑤第四册 第 668—669 页 第六册 第 562 页。
- ⑩见⑦海龄传。
- ⑪见⑤第五册 第 305—307 页。
- ⑫《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第 67 页。
- ⑬见⑤第三册 第 353—354 页。
- ⑭《毛泽东书信选辑》第 435 页。
- ⑮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见《历史研究》1980 年第一期第 8 页。
- ⑯见④ 第 1484 页。

## 论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近年来，在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提法，甚至被认为是什么“新”观点。这里就其中几个问题，提出商榷。

### 一、《天朝田亩制度》不是“反动的”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重要制度。它的内容非常广泛，关于土地问题规定：“凡田分九等，……分田照人口，不分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sup>①</sup>这个平均分田法，在当时战争频繁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下，在一些地区并未实行，但却体现了农民的利益和要求。而且，佃农耕种的地主的土地为自己的产业，太平天国发给“田凭”，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它打击了地主阶级，保障了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在客观上也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因此，它是个革命制度。但有的文章却对这个《制度》加以否定，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搞了平均主义。还说：“太平天国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宁受比较正常、相对减轻的封建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而不要平均主义。《天朝田亩制度》，与其说是革命的，毋宁说是反动的。”等等。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史实已经证明，广大群众是热烈拥护太平天国起义的。否则，太平天国初期势力很小，并常受挫折，广大农民为何积极参加它的队伍呢？为何不安分守己地去“受比较正常、相对减轻的封建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呢？

有的文章说：《天朝田亩制度》不能普遍实行，就证明它是空想